

順「勢」與健忘

● 劉培偉

法國著名漢學家余蓮所著的《勢：中國的效力觀》對中國文化和思維方式的深刻剖析，或許能為我們解開民族的健忘症之謎提供有益的啟示。作者以「勢」來凝練和探索中國文化，是非常有穿透力的。



余蓮 (François Jullien) 著，卓立譯：《勢：中國的效力觀》(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

「當他們屠殺猶太人時，我沒有做聲，因為我不是猶太人；當他們屠殺基督徒時，我沒有做聲，因為我不是基督徒；當他們來抓……時，我保持沉默，因為我不是……；後來他們要殺我，已經沒有人能為我做聲了……」這是德國牧師尼莫拉

(Martin Niemöller) 被納粹殺害前所留下的一段警世遺言(美國波士頓猶太人屠殺紀念碑上銘刻着尼莫拉牧師留下的短詩《因為我不是猶太人》)。災難過後，我們有沒有這樣的反省？我們民族的健忘症早在一百多年前即已被魯迅先生淋漓地揭示，今天的狀況是否有所改變？文革過後，文化界曾經興起過「懺悔熱」，但正如鄧曉芒曾經犀利地指出的：這些懺悔是不真誠的、不徹底的，因為人們更多地是強調自己被「別人」騙了，而不是「自己」屢次被騙(鄧曉芒：《靈之舞：中西人格的表演性》[北京：東方出版社，1995]，頁35-55)。與中國式「懺悔」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尼莫拉特別強調的一直是「我」的罪。法國著名漢學家余蓮 (François Jullien) 所著的《勢：中國的效力觀》(*La propension des choses: pour une histoire de l'efficacité en Chine*，引用只註頁碼)對中國文化和思維方式的深刻剖析，或許能為我們解開民族的健忘症之謎提供有益的啟示。

在中國文化裏，「勢」的應用非常廣泛，從政治、戰略、書法、繪畫、文章之體氣、龍的意象到歷史

觀、時間觀，無不體現着「勢」的運作，可以說，「勢」遍布中國文化的每一個角落。從這個意義上講，作者以「勢」來凝練和探索中國文化，是非常有穿透力的。雖然作者是一位法國人，但他在論證時力求做到客觀，尤其在做中西方文化比較時，特別提醒讀者不要以西方的思維去解讀中國文化，對中國文化的特殊性應該抱以同情的理解。作為中國人，在對作者的善意和良苦用心表示欽佩之餘，筆者更關心的是，該研究有沒有幫助我們解決自己的問題：我們中國人（民族）為甚麼特別健忘？是不是與「勢—效力」的思維有關係？

一 「勢」及其對「理」的消解

該書的主題思想已如其名所示：中國人（文化）並不推崇憑靠知識和理性對超驗域的探索，只關心當下的效力，而效力的取得是靠對「勢」的辨識和應用。中國人非常懂得利用自身所處的局勢，以便取得效果（為自己帶來利益）。在他們看來，人應該做的，就是要識別並充分利用可能產生效力的因素以為自己謀利，這就需要他們從那些還處於萌芽狀態之中的元素裏，分辨哪些是有益的而加以鼓勵，哪些是有害的而應該阻止（參見「內容簡介」），這種辨識就是對「勢」的把握。

中國人擅長於策略和技巧的研究，他們關心利用何種策略能佔優勢，並防止「勢」朝着不利於自己的方向變化，保證有利於自己的力量持續不斷地為自己帶來優勢。這就

要求不斷地變換策略，讓別人摸不準自己到底是怎麼想的，同時使敵方逐漸失去主動性（頁12）。所以，用「勢」的最高境界是不用正面交鋒即已知道結果。處於劣勢者，也無時無刻不在尋找策略以便盡快佔據優勢，而不是思考構建一種超越這種操縱與被操縱遊戲的制度設計。用時下通俗的話來解釋就是：我們憤怒，不是因為覺得不公平，而是覺得自己處在不公平中的不利位置；我們不是想消滅這種不公平，而是想讓自己處在不公平中的有利位置。於是問題來了：為甚麼不能超越這種遊戲呢？

「勢」究竟是甚麼？「勢」辨不清、摸不着，百變無痕，但又處處顯現。為了便於我們理解，余蓮勉為其難地為「勢」下了個不是定義的定義（雖然下定義有可能違背了「勢」的變幻莫測的精神）：有效力的布置所產生的可能性（頁3）。其運行機制是：一切使事物現實化的能力都同時具有陰、陽兩方面，陰陽自身構成一種自足的布置，它們互相依存而產生的「勢」獨自引導現實的發展方向。也就是說，陰陽的對立和互補關係足以說明現實；不論是甚麼樣的現實，都是「勢」的結果。它包括了現實發展的各個階段的情況，以及由各個情況衍生出來的每一個個別趨向（頁195）。用余蓮的話來講就是，中國文化認定自發性的生成本身會自我調節，自此所形成的規範便作為事物超越現實的根基（頁203）。

在筆者看來，這句話說透了中國「勢」文化的秘密和威力：「勢」將「理」吸納進自身，「勢」本身就足以作為「理由」（頁213）。每一次的趨勢

《勢：中國的效力觀》的主題思想如其名所示：中國人（文化）並不推崇憑靠知識和理性對超驗域的探索，只關心當下的效力，而效力的取得是靠對「勢」的辨識和應用。中國人非常懂得利用自身所處的局勢，以便取得效果。

中國人沒有對「勢」做任何反思即已接受其正當性。「勢」對「理」的吸納並未能解決其自身的正當性問題，相反是消解了問題，因為我們關心的不是普適性的「理」，而是當下實用的「效力」。然而，正當性的幽靈是繞不過去的。

都是合理的，都有它自己的「理」，且「趨勢只能如此運行，因為『不能以其他的方式進行』」（頁205）。所以順理成章的是：一方面，惟有遵行「理」才能產生真的有利的趨勢，因為「理之順即勢之便」（頁213）；另一方面，務實之理是結合運行中的「勢」，任「勢」載其前進而為其帶來效益。這樣，「理」便匍匐在「勢」面前，失去了對它的任何約束力（頁45）。致命的是，「勢」與「理」的合一使得「勢」將任何由形式的變化而產生的因素都包含了進去（「反常」也被視為事物自身的一種調節模式，乃「勢」最終超越自己所必須），從而徹底封死了任何的偶然和自由因子的出現。

余蓮非常犀利地指出，中國文化對秩序有一種先天的認同感，而對無政府的混亂有一種強迫性觀念，即暴君統治總比無政府狀態要好（頁208）。中國人寧要惡治，也不要「治不在」，因為在他們看來，畢竟惡治也是在治。「惡」不是因為缺乏調節機制，而是該機制往亂的負面方向運作。他們認為，機制運作不良是不可或缺的，如果沒有這些不良的運作而沿着好的方向發展，反而使「勢」失去了其潛在的可能性。這樣的一番辯解，使得本來是一個從理論上區分和反思「善惡」之治的良好機會也就喪失了。余蓮嘆道，中國人寧可滿意於（與各種原則的理想性相反的）某一個「理」的權宜之計——其合理性只來自力量的強弱關係，承認「勢」本身就足以作為理由，也不願意拒絕這兩個詞之間那太方便的可逆轉性，重新使權利與才德相應的反抗在中國人那裏是不可思議的（頁209）。

與中國人不同，西方人自古希臘時代就特別較真，非得要找到一個東西做各種生成和變動的根基不可，因為在他們看來，「變動」是不可靠的。雖然西方哲學史上曾經為尋找這個根基有過無數的辯論，但他們卻一致同意有一個「理」使這些變化成為可能。沒有「理」為根據的變動和生成，對於西方人來講，是無論如何也不能理解的。拿前面「勢」的運行機制來說，如果是一個西方人，他一定要求搞清楚到底「陽」是甚麼，「陰」是甚麼，怎樣才叫「陽勝陰」或者「陰勝陽」，各種「勢」是怎樣的狀況，以及這些狀況為甚麼要發生轉換。在中國人看來，與其像西方人那樣較真，非得把甚麼都說清楚才肯罷休，整天辯論何為真理，倒不如順應其當下之勢，走到哪裏說哪裏。中國人所認同的真正的個人美德，是懂得度過變化，並且在每一次的轉變過程中盡可能取得益處（頁171）。

我們沒有對「勢」做任何的反思即已接受了其正當性。「勢」對「理」的吸納並未能解決其自身的正當性問題，相反是消解了問題——或許我們始終就不曾思考正當性問題（劉培偉：〈論傳統中國政治合法性論證的闕失〉，《學海》，2007年第2期，頁78-82），因為我們關心的不是普適性的「理」，而是當下實用的「效力」。然而，正當性的幽靈是繞不過去的。

二 「時」對「理」的消解

既然不能像西方人一樣，凡事皆歸因到一個原則性的「理」作為正

當性根基，那麼「勢」在將「理」吸納和消解又不足以令人信服時，它最終倚靠甚麼呢？余蓮找到了答案：「時機」。余蓮引用王夫之的話：在運用交替作用的時間邏輯方面，存在着兩種普遍的道理：在任何變化發生之前要避免過度，以免因物極必反而造成反向的過度；發生改變之後，要站穩保持鎮定，同時又必須願意順應變化（頁170）。太着急或太遲鈍都會錯失時機，從而不可能把握「勢」。

然而，又有誰能參透這神秘莫測的玄機，做到恰到好處呢？正如王夫之本人所言，「鮮有人能洞察之。」（頁172）只有那些有智慧之人才能參透。所謂「有智慧之人」，就是靠技巧和操縱進而最終獲勝者。也就是說，誰把握了「時」（機），誰就能得「勢」，誰也就成為「理」的化身。中國文化非常推崇那些順勢而為的人，並將之奉作英雄，所謂「識時務者為俊傑」；相反，那些不能隨環境變化而只是執著地固守某一原則的人，則被視為死腦筋，甚至是賊寇。

余蓮繼續以王夫之曾經引用的案例解釋這一點。按王夫之的解釋，岳飛因為不懂得評估局勢，所以注定要失敗。假如岳飛願意暫時擱置他那不惜代價也要取得榮耀的欲望，或許能等到其政敵去世、侵略者遭遇了困難，宋朝廷可以重新鼓起士氣發起反攻（頁172-73）。同理，當蒙古入侵中原時，如果宋理宗和他的兩位宰相能懂得評估局勢，也可避免敗局（頁175）。在王夫之看來，岳飛和宋理宗抗敵都沒有把握好火候，沒有等候負面的力量自行消退就迫不及待地行動，所以他們的失敗是必然的。

其實，這是典型的「馬後炮」式解釋。它不會擔心遭到任何反駁，永遠不可能被證偽，永遠都能自圓其說。失敗，是因為沒有等到成熟的「時機」就擅自行動；勝利，是因為「時機」已經成熟。把握好時機即是「順勢」，「順勢」才能取勝，也即為王；沒有把握好時機，即是「逆勢」，也就必然失敗，從而成為賊寇。這無疑是一種循環論證，不僅甚麼也沒有解釋，而且走向了一種神秘主義（好像這些都已在冥冥之中注定）。可悲的是，這種解釋模式仍然充斥着當今的中國學術界。

在中國文化裏，歷史是沒有終點的，「明天」總是存在的。也就是說，它沒有西方的末世觀念（頁182），所以中國人認為不必規劃將來，「到時再說」成為他們的口頭禪。他們也不總結過去，不問為甚麼，過去的就過去了；他們從來不關注何以會發生變化，以及何以會發生這樣而不是別樣的變化，從來不去問「如果是相反的情況，結果又會如何」，「難得糊塗」已被奉為經典信條。總之，中國人只知道活在當下——一切都靠「機緣」，該來的自然來，不該來的自然也不會來，只要順其自然就好。然而所謂的「自然」與「機緣」，只不過是各種現實的狀況，而所謂的「順其自然」和「隨緣」，也只不過是「存在即合理」（黑格爾[Georg W. F. Hegel]語）的註腳而已。

由此可見，「時」（機）非但沒有為「勢」確立正當性，而且還為「勢」對「理」的消解蒙上了一層神秘主義的面紗，徹底取消了理論上反思「勢」之正當性的必要。

所謂的「自然」與「機緣」，只不過是各種現實的狀況。「時」（機）非但沒有為「勢」確立正當性，而且還為「勢」對「理」的消解蒙上了一層神秘主義的面紗，徹底取消了理論上反思「勢」之正當性的必要。

我們若不加反思地順「勢」而思而行，只能帶來思維的鈍化和退化。當我們認定沒有一個神聖的「理」來作為判準，無論做甚麼，我們都能找到一個「理」來為自己開脫。「順勢而思」與「順勢而為」的實質是對理性思考的勾銷，這或許正是造成我們民族健忘症的根本原因。

三 順「勢」而思與健忘癥結

余蓮對「勢」的揭示，為我們反思中國人的思維和行為方式提供了深刻的啟示。「勢」論的實質是：沒有一個固定的判準，只有對當時情境的度量，所謂審「時」度「勢」。通俗點講就是：當白戰勝黑的時候，我們認為這是「勢」之必然，是合理的；當黑戰勝白時，我們認為這也是「勢」之必然，同樣是合理的；而當白再次戰勝黑，我們照樣能泰然自若，仍然認定是「勢」之必然，是合理的。

在「勢」本身的正當性都存在疑問的情況下，我們若不加反思地順着此根基不穩的「勢」而思而行，那

只能帶來思維的鈍化和退化。當我們認定一切都以時機、條件為轉移且將其視為自然和必然的時候，我們就沒有必要去反思自己，因為沒有一個神聖的「理」來作為判準；也正因為如此，無論做甚麼，我們隨時都能找到一個「理」來為自己開脫。「順勢而思」與「順勢而為」的實質是對理性思考的勾銷，這或許正是造成我們民族健忘症的根本原因。

惟願我們每個人都能有意識地多作一些理性思考，少一些「順勢而思」和「順勢而為」，從而少一些健忘，我們每個人和我們的民族也因此能少一些苦難。這也許正是余蓮這本著作對我們每一個中國人的有益啟示及對中國文化研究的貢獻。

評說晚年周恩來

● 劉 岩



司馬清揚、歐陽龍門：《新發現的周恩來》，上、下冊（紐約：明鏡出版社，2009）。

周恩來是中共歷史上一個相當複雜的人物，由於國史中連篇累牘的政治宣傳與意識形態言說，他在國人的心目中就成為了一位任勞任怨、鞠躬盡瘁的「人民的好總理」。周還是中共樹立的「道德楷模」，他幾乎集智慧、堅忍、英勇等中國優秀傳統品德於一身，在中國民眾中